

# 从田头到炕头：村民的地理

传统农耕社会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乡村生活围绕土地而存在，并追随四季的节律，往返于田头、炕头之间。依存于土地的农耕生活，决定了村民们开展社会活动需在一日往返距离之内——集市、婚姻、祭祀、庙会乃至乡里村社组织，都在“十里八村”这一范围。韩茂莉发现，这个村民平日对邻里乡亲的称呼，完美概括了村民的出行范围与认知空间。“十里八村”是村民的地理，也是作为学问的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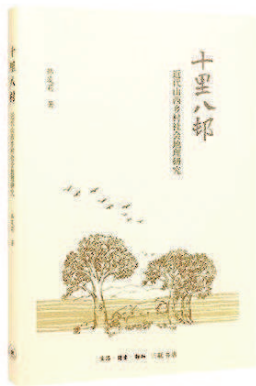
1909年5月，直隶平原，背景是山西西部山脉。美国地质学家张伯林 摄

韩茂莉（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各位朋友好，感谢你们来讨论我的新书《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以往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侧重于讨论地方历史，没有把空间、地理问题作为论述的核心。我的这本书虽然体量不大，但却真正是在地理意义上表述乡间农民的生活空间，我选取了中国人俗语中的“十里八村”一词来概括这个空间。从学术上来讲，社会地理学探讨的是社会中一个群体的形成、活动和地理分布，但这个定义听起来很枯燥，我更认同的定义是——乡村社会地理研究的对象是村民生活和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空间，这个空间简单来讲就是从“田头”到“炕头”。

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基础，在现代话语中土地被称为“不动产”，正是由于土地的“不动产”特征，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都被束缚在以土地为中心的地理空间之上。因此农民从事的活动都要保证在一日之内能够往返，这个范围基本上就是我们俗语中所说的“十里八村”。“十里八村”是对我这本书主题的概括，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村

韩茂莉用“十里八村”命名她的新著。书中用地理学的视角审视近三百年间的山西乡村社会，同时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方法，揭示出依山西推演出的“十里八村”，也能够推广到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十里八村是国家的构成者，这里的村民凭借一方水土铺垫了中国历史的物质基础。

2018年4月9日北大文研读书会在静园二院举办了“从田头到炕头：村民的地理——《十里八村》研讨会”，探讨这项极富特色的研究。《文汇报》在此刊发座谈纪要。



剩余产品较多，门槛值就随着交易力度的提升而提升了，那么这个地区的定期市密度就会大。施坚雅研究过的四川就是如此，那里定期市的设置大概在一里半到四五里之间。而山西就不一样了，在这个高原丘陵地区，不是通过小面积、大人群的集聚度来达到门槛值，而是由一定地理半径内笼罩更多的人群来保证门槛值。山西的门槛值能够辐射的半径有多大呢？那就是“十里八村”，就是在一日之内既能够往返，又能够保证完成交易的距离。

集期的安排一般分两种，有双日集——逢二四六开集，有单日集——逢一三五开集。村民如果在二四六日没有空闲完成交易，就会在一三五日到临近的另外一个集市去交易。之所以存在单日这样不同的集期，原因就在于客源区。单日集的交叉，使村落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客源区之内。客源区是一个独立的，具有共享性的地理空间，每一个单双日交叉的集期所囊括的村落都构成一个客源区。村民在集市上进行

民活动的基本特征。

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是农民从田头到炕头的核心生活内容。在这两个核心内容之外，婚姻、祭祀、行政和交易也是农民生活的重要环节。田头地头以外的空间里最重要的活动是交易。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农民的社会交往空间不限于本村，还包括他们参与交易的空间。我对此十分认同，我们讨论传统农业阶段的乡村社会地理，不管是行政活动也好，祭祀、婚姻也好，最终都和交易活动有关。因此我想和大家交流的一个问题就是村民在集市上形成的认知空间。

## 村民在集市上形成的认知空间

从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和廖什(August Losch)的中地论和区位论传入中国之后，我们中国学者就把它奉为经典。但是，德国经济学家探讨的对象是19世纪的德国，德国地处平原，而且那时已经进入工业化阶段，历史上的中国农村可能不适用于类似的理论。比如山西汾河左有太行、右有吕梁，生产方式以农业

为主，山西农民的交易活动是以定期市为基础的，当地的商业活动处于较低的阶段。

定期市就是我们所说的赶集，赶集不是天天有，而是按照固定的周期举行，不同地区定期市的周期和密度都不同，原因在于“门槛值”。门槛值是我们地理学界十分熟悉的一个概念，通俗来讲，能够确保商人和村民彼此都能盈利的客源基础就是门槛值。能够维持定期市长期存在的门槛值需要需求力度，也就是说，以定期市为中心的地理半径之内的村民对交易有多大的需求。需求力度的高低与地区经济有关，经济发达的地区